

政治

权力继承：俄国政治的迷思

张昊琦

【内容提要】权力继承一直是俄国政治面临的困境。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罗曼诺夫王朝以迄于今，权力继承问题都没有得到顺利解决，而且历史上权力继承问题曾引发国家性的灾难。作为一个制度性难题，它受制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形式或政体性质。前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决定了基辅罗斯权力继承的宗族性特点，顺序制既是当时环境的产物，也导致了国家的分裂。莫斯科公国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继承因专制主义的确立和发展而具有王朝性特点，虽然宗法和宗教的正统性保证了王朝的延续，但权力继承并不平稳。新俄罗斯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以及相关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但因其政体性质，不论是西方概念中的威权主义还是苏尔科夫所称的“普京的长久国家”，权力继承问题仍然难以得到解决。普京虽然希望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完成权力的有序过渡，并在2020年初进行修宪，但是在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俄罗斯，要解决政治权力平稳过渡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俄罗斯 政治权力 权力继承 正当性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0)03-0043-0026

【作者简介】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在世界各地被不断重新演绎，它的俄国版本则是屠格涅夫的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在这个故事中，“草原上的李尔王”、地主哈尔洛夫在衰年来临之际将全部家产分给两个女儿。但是两个女儿背德忘恩，掌握了家产后对父亲百般虐待，最后竟把他赶出家门。本来听天由命的哈尔洛夫，在妻弟的不断挖苦、刺激下终于疯狂爆发，展开报复。他奔回家中，爬上屋顶，亲自拆毁分给女儿的房屋，最后坠落在废墟中死去。

李尔王的故事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政治哲学家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直截了当的政治教诲”，例如王国不该自行分裂，应该避免继承权的纷争，不同类型的权威不得混淆，等等^①。而俄国版的这个故事则更集中于继承权的问题，权力继承这个主题的隐喻更为突出。哈尔洛夫是一个“巨人”，“有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克里斯的力气”，四周的乡邻对他非常尊敬，田上的农民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而在家，他也像一个君主一样。但这个“坚强而自信的巨人”却日益陷入忧郁和沉思，他想将全部家产分给两个女儿，自己抛开田产和家务管理，专注于“灵魂之事”。他甚至不为自己留下一点钱。朋友和恩人劝阻说：“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想把财产分给她们？难道你去世以后，她们还得不到手吗？”哈尔洛夫置之不听。朋友问他对女儿女婿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回答说：“我要对他（女婿）怎么样，便怎么样……他有什么权力呢？至于我的女儿们，她们会供养我……这是她们最重要的天职啊！……她们不再服从我吗？反抗吗？敢吗？她们一辈子怕我，服从我——”^②然而财产权经过大张旗鼓的公证转移后，哈尔洛夫的境遇每况愈下，直到疯狂死去。

这个隐含权力继承的故事其实提出了几个问题：是生前移交权力还是等死后自然地继承？究竟移交给谁，怎样洞察他们的品质和德性？权力移交之后还能保持控制吗？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利？

俄国的权力继承史充满了血腥，权力的诱惑和对权力的贪欲往往会战胜血亲和忠诚。在谈到 1801 年的宫廷政变时，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以揶揄的口吻

^① [加]普兰宁科：《“……这分崩离析的王国”：解读〈李尔王〉》，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 页。

^② 译文均引自[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文集》（第五卷），巴金、萧珊、陈殿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有删节。

说：“亚历山大一世这个沙皇也是踏过尸体，并且是踏过亲生父亲的尸体而登上宝座的。继杀子者和杀夫者之后，在俄国的皇帝宝座上当然也会出现弑父者了。”^①

除了关乎权力场上个体的命运外，权力继承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为最高领导人把握着国家的历史发展节奏，他们的品质和能力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命运，1917年以前是大公和沙皇，苏联时期是总书记，现在则是总统。因此，权力过渡是俄罗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政治困境所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戏剧性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将权力移交给普京，完成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的首次平稳过渡。在执政20余年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完成权力过渡，至今仍是一个未知之数。2024年是俄罗斯当代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晦昧之点——目前所有关涉俄罗斯政治的问题似乎都系于普京在2024年的去留。它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在年初的宪法修改方案而趋于明朗，相反，修宪为人们所想到的各种选项均提供了可能。2020年3月10日，“统一俄罗斯”党副主席捷列什科娃在国家杜马提出“总统任期清零”的草案并获得通过，最容易产生关联性的推断是，这是专门为普京定制的，为他在2024年继续执政进行铺垫。

对于普京近20年的执政生涯，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济加尔有过一段有趣而传神的总结：“一个人偶然成了国王。一开始他仅仅是想支撑住。他很幸运，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成功的斗士和改革家——狮心王。他想进入历史。后来他想过好生活。他成了大帝。后来他累了，想休息了，但也明白了，他没法休息，因为他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雷帝。”^②

本文围绕俄国权力继承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与梳理以及对当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普京执政以来对俄罗斯“政治之体”——“普京的长久国家”塑造的分析，探讨俄国权力继承的历史逻辑和可能趋向。需要强调的是，革命性的权力过渡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因为革命的目的是改变社会政治结构，权力继承则非如此，即使是以政变形式所完成的权力继承，也只是改变最高统治者，以一个统治集团替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已，它旨在“换代”，而非“改朝”。

①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蘅璋等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64—165页。

② Зыгарь М. В.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16. С. 3.

一、制度性难题：俄国历史上的权力继承

有关权力继承的镜鉴一直悬之于俄国历史，它警醒历代统治者进行探索并加以解决，但这个政治困境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制度性的纾解。俄国历史上非正常的权力继承情况时时发生，甚至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14年11月，普京在接见青年学者和教师时曾以基辅罗斯为例说明这一问题：“智者雅罗斯拉夫当然是一个智者，为国家的发展做了许多，但是他没有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确定王位继承规则。俄罗斯的王位继承规则非常复杂、混乱并导致了分裂割据。”他还补充说：“割据时期的历史教训给我们发出了危险信号。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点，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犯这种错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①

追溯俄国历史，最高权力的继承方式或曰制度多种多样，有自然的习俗和惯例、有君主的生前指定、有经过一定程序的选举或推举、有成文的法律制度，当然最引人瞩目而且经常发生的是政变，这些政变可能是通过军事手段，也可能是宫廷阴谋。

（一）自然习俗和惯例

这是基于经验而形成的“自发的社会秩序”，为特定社会集团或群体所接受，并对其成员的行为和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性。在俄国王位继承史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纵横两条继承路线是基本的规则，但两者相互交织之下，一条路线很容易被另一条路线打断，从而使权力继承陷入困境。基辅罗斯时期顺序制的推行是因为留里克子孙支系过多、规模庞大所致，然而也为此所累。

在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前，父死子继是一条明显的线索。按《往年纪事》的说法，留里克死后，将王位交由族人奥列格，并将年幼的儿子伊戈尔托付给他。奥列格死后，长大成人的伊戈尔继位。伊戈尔死后，由于其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年幼，由其妻奥尔加摄政。斯维亚托斯拉夫长大后，奥尔加还政于他。虽然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兄弟之间内讧的原因是父子之间实行家法，而兄弟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大家公认的法制，但是他也提到编年史上所透露出当时隐然存在的不成文的长幼观念^②。这种“尊长”原则从后面的史实即可看出。1015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去世时，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坐镇基辅，而深受兄弟们拥戴的鲍里斯正奉命抗

^① Путин В. В. Встреча с молодыми учеными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истор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951>

^②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6页。

击波洛夫齐人。得知大公去世的消息后，大公的亲兵队劝鲍里斯发兵去基辅继承大公之位，这个建议被鲍里斯拒绝：“我不能对自己的哥哥动手：既然我的父王已驾崩，那他对于我就是代表我父王的。”^① 但是不愿束手屈就的另一位弟弟雅罗斯拉夫在瓦兰人和诺夫哥罗德人的帮助下，与斯维亚托波尔克进行了长达4年的战争，最后登上了大公之位，是谓智者雅罗斯拉夫。不久，雅罗斯拉夫又迎来与兄弟姆斯提斯拉夫的战争。雅罗斯拉夫虽然败逃回诺夫哥罗德，但姆斯提斯拉夫对他说：“你还是坐镇你的基辅吧，你是兄长，把这边（第聂伯河左岸）归我就可以了。”^② 其后，兄弟俩缔结了和约，内讧得以平息。

但是直系长子继承制一直到莫斯科公国时期才确立下来。从卡利塔以来的一百年间，根据大公的遗嘱，大公之位的继承者几乎都是长子，权力并不传给旁系。延续数代之后，这种嫡传的习俗成了正常的制度，人们不再遵循基辅罗斯时期的长幼顺序制。但是在瓦西里二世时期，围绕继承权问题重新掀起了一场内讧。1425年，大公瓦西里一世去世，瓦西里二世继位。其叔父、加利奇王公尤里发兵击败瓦西里二世，并将他放逐。然而尤里得不到莫斯科贵族和平民的支持，处境孤立，只好与瓦西里缔结条约，撤回加利奇。尤里死后，其子舍米亚卡重新发难。当时由数位主教和大司祭组成的高级神职会议向舍米亚卡发出了一份严厉的敕文，指出直系长子继承制是唯一正确的制度。教会的决断使这种权力继承新制度深入人心，获得了社会的支持。这场内讧经历了20余年后，以瓦西里二世的胜利而告终。

11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顺序制”^③也是自然形成的习俗。基辅罗斯实行的是王公统治制。王公之子不论年纪大小，在父亲生前就可以分到一块土地进行管理，只须向父亲纳贡即可。但兄弟之间的政治联系却很薄弱，这为顺序制的实行创造了条件。1036年，姆斯提斯拉夫去世，因无子嗣，雅罗斯拉夫接管了他的全部领地，成了罗斯国家的“专制君主”^④，但这也是基辅罗斯最后一位专制君主。随着1054年雅罗斯拉夫的去逝，罗斯由盛转衰，开始了分封割据时期。诚如普京所说，雅罗斯拉夫没有制定出能够维持罗斯国家统一的权力继承制度。在临终

①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6页。

② 同上，第130页。

③ 对于智者雅罗斯拉夫之后的“尊长”观念和“顺序制”史学界尚无定论，参见 Будовниц И. 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IV вв.), М. 1960. Очерк 5: Идея единства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 这里采用的是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一派的观点。

④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131页。

的遗嘱中他只是告诫自己的儿子要和睦相处，并且把国家分封给各个儿子^①。但是雅罗斯拉夫之后实行的以宗系长幼原则和领地流动统治原则为基础的顺序制使王位继承复杂化了。

习俗和惯例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在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兄弟之间的纷争并没有受到习俗和惯例的限制。弗拉基米尔的大公之位就是从兄长雅罗波尔克那里夺取的。智者雅罗斯拉夫之后，作为长子的基辅大公伊兹亚斯拉夫被两个弟弟联手驱逐。在实行顺序制的时期，年长的侄子和年轻的叔父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王公内讧的主题，最后造成了俄罗斯政治的双重分裂——王朝的分裂和全国的分裂。12 世纪 30 年代，罗斯境内已经形成十几个公国，导致分封割据，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基辅罗斯不复存在。当蒙古人突袭而来的时候，各自为政的诸王公再也不能进行统一的抵抗。

（二）君主指定

人为指定意味着君主打破习俗和惯例，凭一己意志进行决断。这个先例是由伊凡三世开创的。伊凡三世之父瓦西里二世经历了长期内讧，想巩固长子继承制，为此他在生前即立伊凡三世为共同执政的大公。伊凡三世效仿其父，也立嫡长子为共同执政者，但嫡长子不幸早亡，伊凡三世面临着立嫡房长孙还是立后妻索菲娅之子瓦西里为继承人的难题。大臣们一致拥立长孙，伊凡三世遂决定立他为共同执政者和继承人，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但后来在索菲娅的积极运作下，伊凡三世废除了长孙，并且说：“我想把大公的地位授予给谁，就授予给谁。”^②索菲娅之子后来继承了大公之位，就是伊凡四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克柳切夫斯基说，伊凡三世亲手破坏嫡系长子继承制原则，“开了一个坏的先例”^③。

伊凡三世之后，君主指定继承人的做法自然地得到了纠正。索菲娅之子瓦西里三世继承了大公之位，后来传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因为失手击毙长子，他死后由次子费奥多尔即位。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国君主米哈伊尔将沙皇之位传给儿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又传给费奥多尔。但是从彼得一世开始，他又重拾君主指定继承人的办法。

彼得在晚年一直为继承人问题而苦恼，其子阿列克谢因反对其改革而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彼得的第二个妻子生育的两个儿子都在年幼时夭亡。如果按照

①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 139 页。

②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30 页。

③ 同上。

直系长子继承制，那么继承权就该落在彼得的长孙、阿列克谢之子彼得（后来的彼得二世）身上。但彼得因为阿列克谢太子的问题而不愿让其长孙继位。1722年2月，彼得颁布皇位继承法令^①，由他个人指定和挑选继承人。彼得二世之后的安娜女皇在即位次年即颁发诏书，指定由外甥女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之子（后来的伊凡六世）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伊凡六世登位时还是个婴儿，不久即被推翻。随即上位的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没有结婚，也无后嗣。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她在位期间就将自己的外甥、后来的彼得三世（彼得大帝之女安娜同一位德意志荷尔斯泰因公爵所生之子）从德国召回俄国，指定其为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彼得三世也被政变推翻。

君主指定继承人的做法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次，被指定的继承人大多不得善终。

（三）推举和选举

在俄国王位继承史上，选举和推举的办法是一种惯例。1584年伊凡四世死后，推举和选举成为一种常见情况，一直到18世纪，有7位沙皇或由选举产生，或由推举决定。每次选举都经由选举人签字的《认定书》加以确认，以证明其合法性^②。

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于1598年去世，由于他没有后嗣，伊凡四世的幼子早先已在自己的领地乌格里奇神秘地死去，而皇后伊琳娜拒绝接位并且剃度出家，因此留下了继承人的问题。最后缙绅会议在牧首约夫的主持下推举戈都诺夫为沙皇。戈都诺夫并非莫斯科具有继承权的世袭领主，而是推选的沙皇，因此他开创了“具有新的国家意义的特殊沙皇的先例”^③。

罗曼诺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尔也是通过缙绅会议的推选上台的，这是继戈都诺夫之后第二位选举出来的沙皇。经历了3年的空位期后，1613年，包括市民甚至村民在内的各个等级的代表云集莫斯科，讨论沙皇的人选。因此这次缙绅会议的代表是全国性的。大会召开前还规定了一个3天的斋戒期，希望以此洗净动乱时期的罪恶。可以说，这次全民代表会议也是相当严肃的。围绕继承人的问题，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是否从外国皇室中选举沙皇。代表们否决了这个提案，要求选出一位本国的君主。会议争论不休，一些竞争皇位者私下活动，花钱经营。

①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6. С. 496-497.

②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XVII вв. М., 1978. С. 60-61.

③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左少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

最后，因为家族的威望以及在“混乱时期”的清白，罗曼诺夫家族年仅17岁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彼得一世的登位也是推选的结果。罗曼诺夫王朝第三位君主费奥多尔去世后，皇位继承发生问题。费奥多尔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前妻之子，14岁即位，20岁即去世。当时阿列克谢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彼得和伊凡均可继承，两人同父异母。围绕继承权的问题，两大外戚家族展开了争斗。在牧首的支持下，一个类似缙绅会议的机构确立彼得为沙皇，由其母、阿列克谢的后妻纳塔利娅摄政。此举引起另一外戚家族的不满，彼得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利用射击军发动“五月暴乱”，结果彼得和伊凡被立为沙皇，伊凡（史称伊凡五世）为第一沙皇，彼得为第二沙皇，由索菲娅摄政。

彼得一世实行君主指定继承人的制度后，并没得到彻底施行。彼得二世是在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后被推为沙皇的。此前由于彼得一世亲信的反对，身为皇长孙的彼得二世未能登位。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两年，她在去世前不久召集各个最高政府机构的成员，包括最高枢密院、参议院、正教院的成员以及各部院大臣，甚至近卫军军官，讨论继承人问题。叶卡捷琳娜一世本属意于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但最高会议坚决拥戴彼得二世，这样她只得勉强同意册封彼得二世为继承人。

（四）法律制度

上述王位继承中所采用的习俗和惯例、君主生前指定以及推选的办法，都不是成文的制度。俄国历史上还颁布过王位继承法。前述彼得一世在1722年2月5日颁布的继承法令，确定了君主自行指定继承人的办法。在此之前，1714年彼得还颁布了一份关于一子继承制的谕旨，其中规定不仅可以按照遗嘱，还可以根据以往的原则，即若无子则由长女继承的办法。但彼得的谕旨和法令在他身后成了一纸空文，后来的彼得二世还是被推举为叶卡捷琳娜一世的继承人。

鉴于王位继承的“例外”情况较多，1797年沙皇保罗颁布了俄罗斯帝国时期最后一部继承法令。作为彼得三世的当然继承人，保罗被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排挤，而且被剥夺了参与国事的一切权利。叶卡捷琳娜二世晚年还想剥夺保罗的继承权，因此母子关系极差。保罗痛感没有明确王位继承法所造成的弊端，上台后废除了彼得大帝1722年的王位继承法令。在他加冕典礼的那一天，即1797年4月5日，颁发敕令，规定皇位由罗曼诺夫家族世袭，以长子继承制替代了彼得大帝定下的由在位君主自由挑选继承人的做法^①。这个敕令结束了俄国王位继承

^①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24. С. 587-589.

问题的混乱状态。整个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出现问题。

（五）政变

如果说上述四种方式是正常的继承方式，那么政变则是非常的继承方式。但是在俄国王位继承史上，政变的方式也成了常态。彼得一世之后皇位继承问题尤其混乱，俄国进入“宫廷政变时代”^①，而且是女主接连执政。到19世纪初的8位沙皇中，有4位是通过宫廷政变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一世、伊丽莎白、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

彼得一世临终时没来得及指定明确的继承人，“皇位只好交由偶然情况决定”^②。按照惯例，应该由皇孙彼得二世继位，但彼得生前的亲信缅什科夫等人害怕彼得二世继位后报复那些迫害其父亲的人，遂通过近卫军团拥立叶卡捷琳娜一世登位。

安娜女皇统治期间大量起用外国人，“比隆苛政”引发贵族和人民的不满。1740年她去世时所指定的继承人伊凡六世还是婴儿。次年，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在近卫军和贵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登上皇位。伊丽莎白在位20年，但是她指定的继承人彼得三世行为乖张，从小接受德意志风俗的熏陶，是普鲁士制度的狂热崇拜者。相反，他的妻子、同是德意志出身的索菲娅（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进入俄国后，很快“俄国化”。彼得三世即位后无视俄国的国家利益，推行亲普鲁士政策，引起俄国贵族和近卫军的不满。在近卫军的支持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三世即位半年时就发动政变，自己登上了皇位。

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次宫廷政变是在180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继承人保罗虽然颁布新的王位继承法，确保了整个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皇位的顺利传承，但他自己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者，因其对内对外政策引起统治精英的不满，在1801年3月的政变中被缢杀，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

彼得大帝之后的数十年间，宫廷政变次数之多为俄国王位继承史所罕见。这些政变都是由近卫军参与的，反映的是统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列宁在评论这种现象时曾说道：“在那个社会里，政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就行了。”^③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3页。

② 同上，第252页。

③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载《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7页。

纪的苏联并没有绝迹，赫鲁晓夫在 1957 年挫败了一次政变，但在 1964 年却屈服于另一次政变。

二、权力继承与正当性

在对历史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关于权力继承与正当性^①的问题。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正当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而纯粹强制形式的统治，“不会煞费苦心地主张正当性的，因为其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证自明的或天然正当的——至少在‘掌权者们’看来是如此”^②。正当性是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它为统治提供依据。韦伯以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作为三种基本类型。当代学者赵鼎新则将其分为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三种，他认为韦伯的传统型和魅力型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型之中。在赵鼎新看来，魅力型最不能给予政权以稳定的正当性基础，而宗教意识形态要比任何世俗意识形态更能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正当性基础^③。本文在探讨俄国权力继承与正当性的关系时，基于其传统专制性特点，主要考察三个问题，一是继承人的身份，二是继承程序，三是继承人的德性。

首先要看到，国家的性质与权力的继承及其正当性是直接相关的，俄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的权力继承方式既以其国家性质为背景，同时也逐渐影响和改变国家的性质。

作为贵族式共和国的基辅罗斯，其实是韦伯所说的“世袭性”（*patrimonialism*）的前现代国家，具有明显的宗族性，是一种权力极为分散的政治形式。代表“最高权力”的大公并不像后来的沙皇一样拥有专制甚至无限的权力，在 11 世纪中叶之前，“一人专政是政治上的偶然现象，并不是政治制度”^④。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大公拓展自己权力和权威的主要方式与中世纪的欧洲并无二致，一是宗族式的扩散，通过为子孙分封土地进行管理，一是通过暴力攫取资源，使民众驯服^⑤。相应地，管理封地的子孙向大公纳贡。俄国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有时子孙并

① Legitimacy 在汉语中常译为“合法性”，与另一词 Legality（“法律性”）相混，其实应该译为“正当性”，本文在此使用“正当性”。参见刘毅：《“合法性”与“正当性”译词辨》，载《学术评论》2007 年第 3 期。

② [英]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0 页。

③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266—268 页。

④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第 185—186 页。

⑤ [美]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郇菁、张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 页。

不愿向大公纳贡，大公就发兵讨伐。例如，智者雅罗斯拉夫在管理诺夫哥罗德时，按规定应向基辅缴纳2000格里夫纳钱币，但他没有上贡，结果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大公想亲自前往讨伐，而雅罗斯拉夫从瓦兰人那里搬来救兵，准备对抗自己的父亲。只是由于大公病逝，这场战争才没有发生^①。父子间即是如此，遑论兄弟。“亲属关系是永久性权力的最重要来源”，但是“征服的范围越大，统治精英间的亲属关系就越是紧张和虚伪”^②。据格列科夫论证，当时的分封王公在外交中拥有相当的分量^③，内政中的独立性更是如此。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形式中，不论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方式，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脆弱性来自两方面，一是暴力，二是正当性。分封王公之间物质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差异增加了他们通过暴力来解决继承问题的可能性，而作为当时正当性来源的宗法制并不能使大公或其继承人的权威必然变成对于他人的“永久的强制性”权力，“更不能创造可继承的制度性权力”^④。俄国历史上独特的顺序制既是这种政治形式的产物，也加速了这种政治形式的瓦解。为了消弭兄弟之间的冲突和内讧，王公们在1097年举行了柳别奇会议，只是达成了口头上的约定，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结果会后不久又开始了冲突。普京在接见历史学者和教师的会上责备智者雅罗斯拉夫没有制定明确的权力继承规则，其实是苛求古人，雅罗斯拉夫即使制定出便于集权的规则，在他身后也无法做到。

韦伯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团体^⑤，拉克曼在韦伯和迈克尔·曼的基础上，将国家视为“定义和创造合法性的机制，也是积累资源、行使这种合法性的组织”^⑥。

俄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专制权力的实现一直到16世纪中期才得以完成。在蒙古桎梏期间，莫斯科公国经过数位王公的隐忍，积蓄了相对于其他公国的足够实力。因为属于罗斯宗族各支派的幼系王公，莫斯科王公无法依靠长幼顺序来保障自己的地位，因此一开始就不按习俗行事，而是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到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在幅员上超过了当时罗斯尚存的任何一个大公国。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大公

①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105页。

②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③ Греков Б. Д.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3, С. 133-135.

④ [美]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3页。

⑤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⑥ [美]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1页。

之位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逐渐占得上风。自 1328 年卡利塔获得大公之位后，大公之位就一直由莫斯科王公世袭。大公是蒙古人统治罗斯的代理人，可以假汗王之名对其他王公发号施令，收取税金，扩大封邑。1299 年，都主教驻节地由基辅迁至弗拉基米尔，对于这个信仰东正教的民族来说，莫斯科抢得了精神上的先机。在物质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莫斯科开始构建有关自己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意识形态：1. 宗法上的正统性。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留里克系谱，而且还为留里克家族与古罗马和拜占庭的帝王攀上了血缘关系。这也是“第三罗马”思想政治化的理由之一。1547 年伊凡四世确立沙皇制度，宗法上的正统性是莫斯科向外国使节证明其君主享用沙皇称号的依据。2. 君权神授。莫斯科君主鉴于自己在新形势中的地位，超越权力来源的世俗概念，从神学中寻找肯定自己的依据。在他们建构的意识形态中，沙皇是作为上帝在人间的直接代理人而存在的。在权力继承的程序中，加冕典礼相当重要，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涂油仪式，它意味着沙皇和上帝达成契约，也意味着君主与人民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联盟，皇权得到人民的承认。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延续至罗曼诺夫王朝。乌瓦罗夫所归纳的“专制主义、东正教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原则，是沙皇制度的基石。

因此，沙皇之间的权力继承都是在这种正统性和神圣性的底色下完成的，1917 年之前都没有被撼动。这是王位继承人的身份正当性问题。17 世纪初“混乱时期”的开始因留里克王朝绝嗣导致继承人身份问题而引起，经过十余年的动荡后由于米哈伊尔的选出而得到了平息。俄国历史上亦出现过“僭位”问题，但都是在正统性的旗帜下展开的^①。

在继承程序方面，前面已经归纳了俄国权力继承中的五种方式。不论是由沙皇凭借自己的意志指定继承人，还是由长子世袭继承作为制度得以确立，都是专制王朝的性质所决定的。最有特色的是选举和推举。选举机构主要是缙绅会议，它是 1550 年由伊凡四世设立的。瓦西里三世去世后，由于其年幼的继承人伊凡四世尚需监护，政权长期落在波雅尔大贵族手中。为了对抗波雅尔大贵族，伊凡四世成年后首次设立了缙绅会议。从历史上看，它确认继位沙皇，核准进行较大的司法、行政、财政及军事改革，审议国家的对外政策及税收制度。但它只是临时性的机构，没有确定的职能，没有常设代表，也没有选举代表的规范和期限。真正具有全民意义的选举是 1613 年罗曼诺夫王朝首位君主米哈伊尔的当选，这

^① 张昊琦：《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在俄罗斯帝国历史上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但是缙绅会议后来随着农奴制的加强逐渐失去了全民性，它在17世纪的历史就是它“解体的历史”^①。说到底，它只是“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可以利用的工具”^②。无怪乎克柳切夫斯基说，在有国无君、重建政府之际，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就出现了^③。

相对于选举，推举则是由上层机构如波雅尔杜马、宗教会议以及后来的参议院和其他国家机构来完成的。波雅尔杜马由波雅尔大贵族组成，首先是一个立法机构，与沙皇一起管理整个国家。虽然波雅尔大贵族经过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波雅尔杜马仍然是一个“限制皇权的非官僚机构”，对皇权的限制一直贯穿着整个17世纪^④。宗教会议也是伊凡四世为对付波雅尔大贵族而于1551年设立的。18世纪之前，它是皇室家族、宫廷朝政乃至国家所有重大事件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王位继承权方面有重要的影响。牧首往往是王位继承人推举会议的主持者，例如戈都诺夫和彼得一世的推举会议都是牧首主持的。但是彼得一世为了实现“完全的”专制，1711年以参议院取代了波雅尔杜马，1721年颁发《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牧首职位，将东正教会置于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之下。因此后来王位继承人的推举往往由参议院、最高枢密院甚至更小范围的宫廷圈决定，这为密室操纵和相继迭起的宫廷政变提供了空间。

在推举王位继承人的历史中，安娜女皇的登台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彼得二世在位两年即去世，最高枢密院不按任何程序，也未通知其他高级机构就推举伊凡五世之女、寡居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登位。此举纯粹出于最高枢密院的自私想法，他们想通过这种推举限制沙皇的权力。叶卡捷琳娜一世临终前曾立有遗嘱，规定皇位由皇孙、她的两个女儿安娜和伊丽莎白、皇孙的姐姐四人以及他们每个人的后裔继承，如果前一位无嗣，则由下一位顺次继承。但最高枢密院否认了这个遗嘱，认为叶卡捷琳娜出身低贱，本没有资格取得皇位，她的女儿属于私生女，应该排除在外。结果他们从伊凡五世一支中选择了其女安娜，同时拟定了限制安娜权力的即位条件（“米塔瓦约定”），规定安娜即位后与最高枢密院共同治理国家，未经最高枢密院同意，不能宣战、征税以及支出费用，不能擅自委任官员，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209页。

② 曹维安、谢慧芳：《论俄国缙绅会议》，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

③ 同上，第211页。

④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册），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不能改嫁及指定继承人；否则将“失去皇位”^①。安娜答应“无保留地遵守一切”，但她归国后拉拢近卫军，并利用广大贵族对最高枢密院的不满，随即撕毁了即位条件，宣布自己是“专制君主”，并撤销最高枢密院。对那些意图限制女皇权力的贵族来说，这是一桩破产的“幕后交易”。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继承人的德性问题。一些学者说到民主政体取代君主政体，“不仅是政治支配权的转移，还有德性观念、精神品质的支配权转移”，那些“王才气概、领袖尊荣、卓绝的个人优异品质等观念”不再拥有“主权”，也不再受人景仰^②。在俄国的政治思想史中，19世纪下半叶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吉霍米洛夫等不遗余力地为君主制进行辩护，认为“专制者”的权力“不是特权，不是人类权力的简单集中，而是沉重的责任、伟大的服务、人类忘我的顶峰，是十字架，而不是享受”，对它的限制是逃避良心和上帝^③。显然，这种辩护是基于神性政治而不是出于现实政治，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君主的德性不能仅仅从出身的高贵和居位的尊荣来衡量，更应该从他们的品质和能力来评价。

俄国的历史中亦有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这样的强人和雄主，但这类君主只是极少数，相反庸君比比皆是。克柳切夫斯基曾经点评说，“莫斯科历代的大公，如伊凡、谢缅、另一个伊凡、季米特里、瓦西里、另一个瓦西里，都是相当平庸的人物”，“在伊凡三世以前的所有莫斯科王公，就像两滴水一样地彼此相似，以致研究者们有时很难分辨出谁是伊凡，谁是瓦西里”，“他们与其说是一些历史人物，不如说是编年史上的标志”^④。当然，相较于误国的昏君来说，能够守成的庸君已是难得。恩格斯在刻画尼古拉一世时说：“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作毅力的表示，把任性执拗当作力量的表示。”^⑤尼古拉一世继承的是一个已经站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心的俄罗斯帝国，但是他错误的决策使俄罗斯光辉尽失，十年间就从舞台中心跌落下来。1917年二月革命后，极端保皇分子普里什科维奇发出绝望之声：“如果我心目中甚至都没有那样一个人的话，我怎么去致力恢复君主制？说说这些人吧，尼古拉二世？疾病缠身的阿列克谢太子？世界上我最痛恨的那个女人（皇

① [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1页。

② [德]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译本前言，第62页。

③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Критика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1997. С. 531-532.

④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第47—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

后)？我作为保皇分子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我看不到哪个人能把俄罗斯领入平静的港湾。”^①

在俄国的君主系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生物学问题：在沿着一条狭窄的宗族脉络相继登台的君主中，病弱者、智能低下者、性情乖张者充斥其中，根本就不堪国任，他们只能为那些宫廷弄权者、策划阴谋者、发动政变者提供历史记录。因此，尽管有严格的宫廷教育，也无济于事。贵族和宫廷小圈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推举过程中往往并不考虑这个问题。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雄主和强人往往是身后乱象的制造者：“混乱时期”之因应该回溯到伊凡四世身上，而彼得一世则开创了数十年的“宫廷政变时代”。原因就在于，这些强人意志力强大，敢冒风险发起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属于体系的创建者，其政策和措施往往在身后难以为继。

在权力继承的三项正当性中，正统性虽然能保持权力在宗族脉络中相传，但是各种继承方式和制度都不能保证权力继承的稳定性，优异的品质和出众的能力也不是权力继承的必要条件。俄国历史上除了19世纪王位继承保持了相对平稳之外，其他时期往往充满了动荡，给国家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王朝的政治问题最后导致民族危机；而19世纪下半叶君主的平庸又将君主制引入不归之路。

三、“普京的长久国家”与权力继承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总理。在叶利钦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的情况下，对普京的任命在外界看来也是一桩极其平常之事。但是新年前夕叶利钦突然辞任，将总统一职交由普京代理，却是一桩极富戏剧性的事情。聚光灯立即集中到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的普京身上。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过渡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是通过表面上的民主过程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及其执政精英声名狼藉，但是操纵了继承权，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将忠诚置于首位。叶利钦突然辞去总统职务，并通过一系列运作，使普京

^① Деникин А. И.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Борьба генерала Корнилова. Август 1917 г. – апрель 1918 г. М., 1991. С. 26.

轻易地赢得了总统大选^①。

普京执政已 20 年。如果 2024 年他继续参选并担任总统至 2036 年，那么他在位时间将达到 36 年。这在俄国政治史上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伊凡雷帝居位 51 年（1533—1584），彼得大帝在位 43 年（1682—1725），斯大林执政 29 年（1924—1953）。但是，在确立了宪政的新俄罗斯执政如此之久，其影响尤其对权力继承的影响则极其深远。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在苏联的废墟上重建政权，确立了三权分立，实行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似乎为“政治权力的有序继承”铺平了道路。但事实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简单问题。1996 年的总统大选是叶利钦寻求连任的卫冕战，但他选前的支持率极低。在“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条条框框”获胜希望非常渺茫时，他甚至考虑“用超越宪法规定的这个品质问题上的沉重损失作为代价”来行使总统的职权^②。为了防止共产党上台执政，他就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延期举行总统选举等问题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只是后来在女儿和丘拜斯的劝谏下，他才没有施行。2007 年在面临各路劝进的局面下，被封为“民族领袖”的普京没有修改宪法，继续担任总统，而是让自己的战友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实行所谓的“梅普组合”。在 2011 年普京被推举为总统竞选人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普京利用宪法表述的模糊性为自己继续执掌总统职位的政治布局。虽然普京继续参选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但却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在之前他执政的 8 年中是没有过的。在他两届总统任期越来越接近尾声之际，2020 年初的修宪又为他继续执政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下。

普京之后的权力继承目前仍是一个迷局，对 2024 问题的沙盘式推演只是罗列出各种可能的方案^③，并不能揭示当代俄罗斯政治中的权力继承困境。要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中的权力继承困局，需要首先考察其政体性质。

关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体性质，“威权主义”是一个总体标签。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西方学者基于民主机构的地位、反对党的地位以及不确定性的水平，又将威权主义划分为竞争性威权主义（选举威权主义）和纯粹性威权主

① Ra'anan, Uri, ed., *Flawed Succession: Russia's Power Transfer Crisi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② [俄]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纛西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29 页。

③ 一些学者综合目前存在的各种推测，归纳为普京留任、去任和彻底离去三种情境下的七种选项。见马龙闪：《当代俄罗斯向何处去？》，载《俄罗斯学刊》2020 年第 2 期。

义^①。由于叶利钦时代的政体“相当开放”，“选举都是高度竞争性的，立法机构运用了相当大的权力，并且私人的大众媒体定期地批评叶利钦并为反对派提供平台”，因而被西方学者归为竞争性威权主义^②。相反，由于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选举中的竞争性持续消散，选举越来越不开放，没有给反对派人物留下通往权力之路的真实前景，而被归为纯粹性威权主义^③。而俄国学者在此框架下稍作调整，将普京执政的第一个十年（2003—2012）视为竞争性威权主义，因为当局虽然牢牢地控制权力（包括利用行政杠杆和选举舞弊），大幅限制政治竞争和媒体自由，但也因为在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反对派也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他们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也有公民和精英团体的支持。2012年之后，由于普京将“主权”概念绝对化，以“传统价值观”作为现代化的支撑，从事所谓的“精英国有化”，拒绝承认苏联解体后的国家边界，与西方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抗，俄国学者遂将其称为“霸权性威权主义”，其实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纯粹性威权主义^④。

西方学者提出的“混合体制”其实是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翻版。世界上许多政体都是混合政体，在某种程度上将民主和专制因素结合在一起^⑤，但是选举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等民主因素只是其表面现象，而威权主义则为其实质^⑥。学者通过对俄罗斯选举的困境、大众媒体的困境和国家的困境的分析，认为在混合体制中统治者既不接受自由公正的选举，也不通过取消选举来应对选举的困境。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操纵选举并寻找其他办法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罢免的机会^⑦。

相较而言，萨克瓦的“双重国家”更能揭示当代俄罗斯政治运行的机制和动力。他认为，当今的俄罗斯运行着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秩序，其一是受法律规范的宪政秩序，体现为苏联后期民主运动和当代自由民主制的规范性价值观，政党、议会及代议制活动受选举法和相关法律的规范。其二是行政秩序，它已经成为一

① Steven Levitsky &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美]威廉·齐默尔曼：《统治俄罗斯：从革命到普京的威权主义》，辛亨复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 Steven Levitsky &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p. 191.

③ *Ibid.*, pp. 370-371.

④ Кирилл Рогов, 20 л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ежима // *Ведомости*, 7 августа 2019.

⑤ Hale, Henry E. "Hybrid Regimes: Wh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Mix", In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edited by Nathan Brow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45.

⑥ Екатерина Шульман, Какой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21 января 2015. <https://meduza.io/cards/kakoy-v-rossii-politicheskiy-rezhim>

⑦ Nikolay Petrov, Maria Lipman & Henry E. Hale, "Three dilemmas of hybrid regime governance: Russia from Putin to Putin", *Post-Soviet Affairs*, 2014, 30:1, 1-26.

种独立于规范性国家之外的等级制，并不受宪政秩序的约束和限制，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和随意性，在实际的运作中往往越出宪政秩序^①。

鉴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所经历的动荡，俄罗斯体制内精英对民主大多抱持一种排斥心理。杜马前副主席纳罗契茨卡娅写道：“我对被称为民主的制度没有幻想；在世界范围内，这是最不民主的社会治理制度。”^②同样，政治学家特列季亚科夫也说出了体制内精英的心声：“多党民主制不起作用”，“为什么要向俄罗斯强加一些已经在西欧运转不良的东西？”^③相比之下，普京对民主的评价相当积极，同时亦宣称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对强大国家的向往与对专制主义的排斥交相出现在他的言辞中。上台伊始，普京就表示，“俄罗斯不应也不能成为警察国家”^④。2005 年 4 月，他还引用俄国哲学家伊里因的话指出，“国家权力有其局限性”^⑤。2012 年他在国情咨文中表达得更为全面：

“俄罗斯没有也不可能有除民主之外其他的政治选择。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赞同的正是全世界都接受的通行的民主原则，但是俄罗斯民主，这是有着民族自治传统的俄罗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要搞外人强加给我们的什么标准。……执政党、政府、总统都可以更换，但不应触动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中断国家发展的延续性，改变国家主权和保证公民权利与自由。民主，这不仅是有机会选择政权，而且有机会监督政权和评价其工作结果。我们应当更为关注发展直接的民主、直接的民主政治……政治竞争无疑对国家有好处，因此我们应当制定自己一整套严谨的政治竞争规则。”^⑥

普京所说的民主当然是“俄罗斯民主”，其实就是他第二任总统期间苏尔科夫所倡导的“主权民主”。“主权民主”作为应对“颜色革命”的手段在普京执政的第一个 10 年中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俄罗斯需要新的政治宣示，苏尔科夫的《普京的长久国家》一文应时而生。作为核心关键词的“普京主义”本是西方学者的发明，但被苏尔科夫直接搬用过来；相对于“威权主义”的学术表达，俄

① Richard Sakwa, "The Dual Stat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0, Vol. 26, No. 3.

② Нарочницкая Н. Русский ход развития. М.: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5, С. 11.

③ Третьяков В. Конец партийности и сослов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 По-другому: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традиции смен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од ред. А. В. Щипков, М.: Абрис, 2017, С. 96-97.

④ Путин В. В. Россия н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и не буд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https://www.gazeta.ru/2001/02/27/gossianedolz.shtml>

⑤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5 апреля 200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

⑥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罗斯庞大的政治机器由“意志绵长”者所创建的表述更是直截了当。不仅如此，在这个“普京的长久国家”中，“所有的机制都服务于主要的目标，即最高统治者与公民之间进行可信赖的交流和互动。政权的不同分支机构都会汇聚在领袖身边，认为并非自身具有价值，价值体现在保障与领袖联系的顺畅程度上”^①。显然，这是俄罗斯官方人士对其政治体制的定性。

苏尔科夫在“长久国家”中通过对领袖、国家机构与民众关系的美好描述突出了“领袖”的核心作用，这样领袖似乎就是历史中的“好沙皇”。他站在高高的金字塔顶，通过各个机构与“深层人民”保持着畅通无阻的联系，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与之可以相对照的，俄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则描述了“俄罗斯系统”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治理结构，其特征包括家长制、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以及成为强国的野心。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全能领袖”，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没有平衡的问责制；它不需要固定的游戏规则，它需要的是固定的人^②。而这样的人是可以塑造出来的。

在当代俄罗斯，作为“全能领袖”的普京，他的“强人”形象与所实行的强硬政策如打击寡头、整顿秩序、建立垂直体系、发展经济、恢复大国地位等密切相关，而他个人的“复魅”亦功不可没。除了作为领袖的“修辞艺术”外^③，身体的展示更加醒目，并且越出了“自然之体”的界域而成为“政治之体”的象征。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刚刚上位之时的普京在权力场中尚是无名之辈，但他利用一系列“身体手段”，将自己塑造成为俄罗斯的“英雄”和“拯救者”，与叶利钦后期的病夫形象有着云泥之别。这种效果是明显的。1999年8月，只有2%的民众准备支持普京担任总统，但是到2000年1月，在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控制后，他获得了62%的支持^④。这是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培育政治沟通参与者的存在”^⑤。2007年8月，往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特快列车发生爆炸袭击事件。身体政治升级，普京首次赤露上身骑马的照片出现在媒体。通过展现健壮的肌肉，普京意在向俄罗斯民众承诺，他能保证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在“梅普组合”期间，普京与老虎平静相处、

① Сурков В. 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② Shevtsova Lilia, Putin's Rus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p. 16.

③ Oksana Drozdova & Paul Robinson, "A Study of Vladimir Putin's Rhetoric", Europe-Asia Studies, 2019, 71:5, 805-823.

④ Труд, 27 января 2000 года, С. 1.

⑤ Галина Ор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тело президента//Критика и семиотика. Вып. 3/4, 2001. С. 67.

在图瓦蛙泳、在莫斯科上空驾机灭火，其阳刚之气的展露成为一种无需解释就可以表现权力的方式。2012年后，他更是展现出一副无所不能的外在形象。沃洛金说出“普京在，俄罗斯就在；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的时候^①，实际上是将普京与国家等同起来。这也是“普京的长久国家”的核心所在。

塑造“长久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文化的转向。不断重申的爱国主义是普京第一个10年执政期间回归保守主义的重要补充，而从历史中为现行政治寻找资源则是应有之义。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密集地举行了一系列重大国家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俄罗斯立国1150周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400周年以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100周年等。与此相适应的是，制作和播放了大量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历史影视剧。例如，2018年底第一频道播放的《戈都诺夫》，一反普希金戏剧所刻画的杀害王储、篡夺皇位、失去人心的传统形象，代之以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一心为国的政治家形象。而普京就爱国主义话题的以古论今的表态也意味深长，他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及精英的忠诚问题，回答说：“普希金是一个国家官员或者说沙皇的官员，没人怀疑，相反他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是十二月党人的朋友，这也没人怀疑，但甚至他也曾说过：‘我们有很多人反对的不是政府，而是俄罗斯。’不幸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拥有这样的传统。”^②

苏尔科夫只描述了“普京的长久国家”绵延下去的前景，却没有提及绵延的基础——权力继承。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威权主义政体在制度上解决不了“政治权力的有序继承”问题，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作为统治集团的政治精英出现分裂^③。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历史追溯，“意志绵长”者往往在身后留下乱局。在没有明显的政治继承人的情况下，这个“系统的稳定似乎取决于普京持续的身体和政治福气”^④。普京的权力基础更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和精英圈，他在社会中的政治根基更多地依靠非制度化的魅力，但这需要长期的动员努力来维持^⑤。而

① Есть Путин — есть Россия, нет Путина — нет России. 22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s:// iz.ru/news/578379](https://iz.ru/news/578379)

② Путин В. В. Интервью первому каналу и агентству Ассошиэйтед Пресс, 4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9143>

③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Arnold Hughes and Roy May,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in Black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10, no. 1, 1988; Christopher Clapham, "Epilogue: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0, no. 1, 1988; Milan W. Svobl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Derek S. Hutcheson & Bo Petersson, "Shortcut to Legitimacy: Popularity in Putin's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68:7, pp. 1107-1126.

⑤ Richard Sakwa, "Putin's Leadership: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60:6, 879-897.

对于他之后的继承人来说，这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普京之后的权力继承面临着体制内外的双重挑战，而体制内的挑战较之于体制外更大。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指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才是政治斗争的主题，只有在精英斗争打开结构性的权力缺口，提供了非常规的政治机会之后，其他被统治阶级才有可能登上历史舞台^①。俄罗斯的体制外反对派经过当局十数年的打压，已经沦落到政治舞台的边缘，只有通过街头抗议来显示力量；而体制内反对派则被收买，事实上成为政治的摆设。因此，权力继承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权力精英内部。

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权力精英的结构模式已经迭经变化。据俄罗斯学者的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商业合作项目为基础的“克里姆林宫塔楼”模式，后来发展成为21世纪初期以普京为中心的“行星系统”模式，之后是由十几位最有影响力的精英所组成的“普京政治局”模式，同时还出现了由顶级精英担任股东和经理人的“大集团公司模式”，最近则出现了所谓的“沙皇宫廷”模式，这些模式之间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排斥的^②。如果从代际的角度来看，权力精英的关系则明显地呈现从横向到纵向演变的特点。普京开始崛起之时，并无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彼得堡帮”和强力部门的旧友、同事很快填补了这个基础。这些都是普京的同代人，也是构成所谓“普京政治局”的核心人物，这种模式也被学者称之为“新封建模式”^③。在这个圈子中，普京是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因此，济加尔写道，虽然决策由普京一个人做出，但“普京不是一个人”，“领导人是复数”^④。这些人对普京忠心耿耿，但他们之间则时有矛盾，偶有冲突。2007年切尔克斯夫的公开信事件揭开了这一面纱。2008年的总统过渡人选，普京也是从这个小圈子中挑选出来的。但是自2012年后这种横向模式逐渐被纵向模式打破，最重要的是代际更替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在此过程中，普京逐渐建立并加强了对权力精英的垂直控制，“以中央单一制取代由地区组成的准联邦制和由集团组成的准联邦制”，其突出特点是将联邦政府的副部级和司局级官员任命为地区行政长官^⑤。另一方面，原“政治局”成员则逐渐离职退休，由忠诚的年轻干部取而

① [美]拉克曼：《国家与权力》，译序第7页。

②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 20 лет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литы.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9/08/16/808927-20-putina-transformatsiya>

③ Vladislav L. Inozemtsev, "Neo-Feudalism Explained", The American interest, the March - April 2011

④ Зыгарь М. В.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 4

⑤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 20 лет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литы.

代之。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上一代权力精英的子女开始纷纷登场，在权力的台阶上轻装攀登。

从俄罗斯权力精英的模式和结构来看，普京作为领导人的关键和核心作用，在其之后的权力结构中是无法复制的^①。面对无涯的权力和众多的权力精英，普京所面临的权力继承局面比沙皇时代更为复杂，精英内部的竞争、权力结构的重组、大众政治的考验、对国际局势的应对以及继承人个人的品质等等，都在影响着他的决定。而最为关键的则是精英派系之间的竞争，在威权统治下，“虽然没有法律或正当性来规范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但他们遵循某些习俗和惯例，不过他们在关系破裂时随时准备违反它们……高层的派系分裂对政权的稳定总是构成威胁”^②。此外，关键的还有普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心理和态度。萨克瓦曾经敏感地捕捉到，“叶利钦和普京都是系统构建者，他们不信任他们自己所创建的机构或所统治的社会，因此不断转向准宪法和准政治战略”^③。

历史之镜高悬，远有沙皇时代权力继承的血雨腥风，近有苏联时代的风波迭起。普京多次表示，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为此，俄罗斯在今年初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但是制度化在俄国的政治土壤上具有“调适性”吗？最早运用“政治制度化”概念的亨廷顿，在论及政治制度化程度时认为，它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而衡量适应性的一种方法是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④。显然，从权力继承来看，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执政已经 20 年的普京因为修宪“清零”方案的通过又获得了 2024 年后执政的可能性，尽管他在杜马中援引罗斯福连续执政的案例，以国家稳定为由为自己辩解，但这项制度能规范他的后来者吗？

结语

普京在执政的 20 年中没有给政治对手以任何机会，也没有给同志以任何机会。梅德韦杰夫是他权力之路上一个应合合法性的跳板，“统一俄罗斯”党以及

①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 20 лет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литы.

② Ra'anan, Uri, ed., Flawed Succession: Russia's Power Transfer Crisis. p. 79.

③ Richard Sakwa, "Putin's Leadership: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60:6, 879-897.

④ [美]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4 页。

全俄阵线也只是其政治工具而已。卡尔·施米特曾说：“一个政党进入合法性之门，然后在自己身后将这门关上。”^①从普京修宪的结果来看，他可以以“清零”的合法性名义和程序进入政治殿堂，然后将殿堂的大门关上，不再向其他人敞开。在许多人的眼里，修宪的整个过程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把戏”，显示了普京政治“技艺”的娴熟运用与神人莫测，但这与他修宪前所表达的初衷——至少人们从字面上理解的初衷是不相符的。

当然，2024年总统大选之门的开启还为时尚早，这期间也许会经历许多情境性的事件，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政治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不得而知。在种种客观变化和主观考量之后，普京是否决意参加2024年的大选，是否可能继续执政，现在也无从预测。但毫无疑问的是，普京的修宪行为并没有杜绝另一个“普京”出现的可能性，相反，他的“清零”行为也会为后来者开启效仿之路。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施米特所谓的“立法型国家”，而是“政府型国家”和“管理型国家”，“更适宜于做彻底的或革命或反动的变革和全面、有计划、目光远大的改塑的工具”，可以“诉诸于实际的必然性、事情的状态、局势的强迫、时代的急需和其他不是由规范规定而是由处境规定的辩护”^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因其三权分立以及相关系列制度的确立而具有了规范性的性质，但这只是它的一面，而且是极其脆弱的一面。相反，它的任性和专制的一面有着更深厚的历史积淀，时时驱动着俄罗斯的国家“激情”，更容易在急剧变动的时势或者紧急状态下显露头角，因为这是需要“历史决断”的时刻。俄罗斯历史中的“混乱时期”不单发生在17世纪。20世纪可以说经历了两次“混乱”，1917年革命引发了三年国内战争，1991年剧变带来了近十年动荡。1996年10月，列别德将军被叶利钦总统解职后发出感叹：“俄罗斯最终将是什么结局呢？我们已经400年都处于混乱时期了。”^③十余年后，普京所引用的前辈历史学家的箴言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起了克柳切夫斯基，他说过很多绝对的真理。他曾这样说：‘历史不是老师，她什么也不教。她是监督者，惩罚那些没有学好功课的人。’”^④其实，历史也自有其矫正的逻辑。乱世出强人，强人理乱世，这似乎是俄国历史的铁律，

① [德]卡尔·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第100—101页。

③ Цит. по: Русская реклама. Нью-Йорк, 1996. 29 октября—4 ноября.

④ Путин В. В. Встреча с молодыми учеными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истор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也是俄国“深层人民”的信仰。

俄罗斯政权的性质，不论是学者所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还是“混合体制”、“双重国家”，因为某些规范性的存在以及可能向规范性偏移的趋势，也许会为它走上现代政治之路带来一丝希望。但更有可能的是，作为与西方的“价值竞争”所在，苏尔科夫所谓的以“普京主义”为特质的“普京的长久国家”还将延续下去：“自然之体”消亡，“政治之体”恒在。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即将出现的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俄国的国运和道路的预言：它们“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为达此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①。也许，“人类注定和不可抗拒地沿着长久以来所走的集中化和民主化之路走下去”^②。

（责任编辑 李淑华 刘阳）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81页。

② [德]卡尔·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第208页。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миф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Чжан Хаоци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неизм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блем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о времен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и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власти так и не была успешно решена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власти вызва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катастрофу. Являяс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она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о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д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пределила родовой принцип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власти в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Поскольку система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лась продуктом обстановк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распа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и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ввиду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династ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ю и, хотя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династии, ситуация с наследованием власти была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в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реализуется на основе ее разделения н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ую,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и судебную, а также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т партийная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ы, однако, ввиду характера е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будь то запад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авторитарного режима или обозначенная Сурковым моде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проблема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власти все еще остается нерешенной. Хотя Путин и надеется завершить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транзит власти путе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и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и внести поправки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в 2020 году, однако России, где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невелика,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пройти долгий путь для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лавного транзи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легальность

Succession: the Myth of Russian Politics

Zhang Haoqi

Abstract: Succession has always been a dilemma in Russian politics. From Kievan Rus', the Moscow principality, the Romanov dynasty up to now, the succession of power has not been successfully solved, and it has caused national disasters in history. As an institutional problem, it is subject to the political form or regime nature of the Russian state.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pre-modern state determined the clan characteristics of Kievan Rus' power inheritance. The order system was the product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and also led to the division of the state. The power succession of the Moscow principality and the Romanov dynasty was dynastic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bsolutism. Although the patriarchate and religious legitimacy ensur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ynasty, the succession of power was not smooth. Although the new Russia has establishe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party system and election system, due to the nature of its regime,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wer succession, whether it is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western concept or what Surkov called "Putin's long state". Although Putin hopes to complete an orderly transition of power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and carry out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early 2020,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can be solved in Russia with a low degre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Keywords: Russia; political power; succession; legitimacy; legality